

构建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目标、维度与路径

张颖岚 刘骋

文明维度提供历史纵深,现实维度夯实实践基础,国际维度拓展话语空间,三者共同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目标设定的结构性支点,中国的文化遗产学将真正突破对象性知识的局限,形成兼具解释力、建构力与引领力的理论体系,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确立中国地位。

文化遗产学兼具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特征,是确立文化主体性、强化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提升中华文明国际阐释能力的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学科领域之一。构建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其核心任务是在坚持“两个结合”基础上,贯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概念和学术范畴,推动文化遗产研究从经验性对象走向理论性建构、从依附性知识生产走向自主性范式生成、从被解释对象走向解释性主体的系统性转向。这既是确立文化主体性、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的具体呈现。

长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理论在概念体系、评价标准与制度框架等方面深受西方知识传统影响,“遗产”作为现代性概念,生成于民族国家建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及国际治理体系发展之中,并形成了相对固化的解释范式。这一体系在推动遗产保护规范化、制度化方面具有阶段性意义,但其内在结构的历史生成性与语境依赖性,也限制了对中国文化遗产连续性、多维耦合结构及其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体系复杂功能的解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转化的潜能。

中国的文化遗产深植于自身文明结构,其显著特征是系统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文化遗产不仅涵盖物质形态,更贯通制度结构、生活方式与精神传统;不仅体现历史延续性,也蕴含现实生成性与未来开放性。这种“物质—制度—文化—主体”的交织结构,使文化遗产成为动态演进的“文化生命体”,而非封闭固化的历史对象。由此,中国文化遗产学的理论任务,就是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从对象性研究转向结构性解释,从静态认知转向过程性理解,从局部分析转向系统建构,并把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价值理念与当代中国实践贯通起来,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阐释中国、表达中国的理论范式,推动中国文化遗产学实现从“被解释对象”向“解释性主体”的历史性跨越。

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应在目标层面实现根本性转向,即由长期以“国际控轨”为主导的适应性逻辑,转向以“文明互鉴”为导向的创造性逻辑。这一转变既是学术路径的调整,更是文明立场的确立与理论主体性的彰显,其本质是在全球知识体系重构中确立中国经验的解释权、概念生成权 and 话语主动权。

从文明维度看,其核心在于回答“中华文明何以延续”。文化遗产并非孤立的遗存,而是嵌入文明结构的系统性存在,是制度秩序、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长期互动形成的“文化生命体”。从良渚古城的早期国家形态,到殷墟的礼制结构,再到故宫的国家象征体系,中国文化遗产始终贯穿着“连续性—系统性—生成性—动态性”的内在逻辑。这种连续性并非线性延展,而是在多元结构中不断整合、重组与再生产的结果,从而使中华文明在超大规模社会条件下实现长期稳定与持续演进。因此,文化遗产学的理论目标之一,是通过系统梳理遗产形态与文明结构的内在关联,揭示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生成机制,从而在理论层面回答“何以中国”的文明之问。

从现实维度看,其核心在于回答“文化遗产如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遗产不是单纯的保护对象,而是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构性资源。例如,长江、长城、大运河等文化遗产体系,其保护与利用深度嵌入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城乡空间重构之中,成为连接历史延续与现实发展的文化纽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在公共文化服务与基层治理中可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持续增强社会认同感与文化凝聚力。由此,文化遗产的研究目标之一,是通过系统梳理其功能属性与现代治理结构的内在关联,实现“保护—发展—治理”统一的复合逻辑,从而在理论上回答“文化遗产如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之问。

从国际维度看,其核心在于回答“中华文明如何在全球话语中表达与阐释”。长期以来,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多处

于经验提供与制度参与的角色,理论表达与概念生产相对不足。随着经验不断积累,中国逐步提出具有解释力与结构性的理论主张,在大遗址保护、联合申遗、非遗传承等领域实现从“规则适应者”向“规则参与者”乃至“议题提出者”的转变,这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学正经历由经验展示向理论生成、由局部参与向体系建构的历史性转变。由此,文化遗产的研究目标之一,是通过梳理中国文化遗产实践与国际制度体系的内在关联,提升中华文明全球表达力与理论阐释力,从而在理论上回答“中华文明如何在全球舞台上确立主动地位”的战略之问。

总体而言,从“国际接轨”到“文明互鉴”的目标转向,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学正从外在适应走向内在自觉、从经验累积走向范式建构。文明维度提供历史纵深,现实维度夯实实践基础,国际维度拓展话语空间,三者共同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目标设定的结构性支点,中国的文化遗产学将真正突破对象性知识的局限,形成兼具解释力、建构力与引领力的理论体系,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确立中国地位。

以系统思维夯实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基础

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单一维度的经验累积或局部概念修补,而是以理论自觉为核心、以体系建构为目标的系统性工程。从学理结构看,其基础框架可凝练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四大支柱,彼此支撑、互为贯通,共同形成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化遗产的理论坐标,是实现从经验性描述走向体系化解释的关键所在。

本体论维度关注“文化遗产是什么”,这一基础性问题决定着学科的理论边界。传统解释性往往将文化遗产等同于文物遗存或历史遗迹,但在中国语境下,其本体更为复杂。敦煌莫高窟不仅是壁画与造像的物质集合,更承载宗教传播、艺术交流与多民族文化互动;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更是国家空间组织方式与历史治理逻辑的物质呈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既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与自然生态融合共生的活态见证,也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典范。因此,中国文化遗产的本体,不仅是孤立静态的“物”,而且是“物质形态—制度结构—文化实践”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是历史时间在空间中的凝结,是文明运行机制的可视化表达。本体论的确立,意味着中国文化遗产学应突破单一物质性视角,进入结构性与关系性的系统理解,从而为学科建构提供存在基础。

认识论维度聚焦“如何理解文化遗产”,直接决定理论解释的深度与广度。文化遗产的传统研究倾向于类型学或分类学,将其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古代”与“近现代”等类别,但这种方法易割裂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与生成性。在中国语境下,文化遗产形态往往高度交织共生。例如,苏州古典园林不仅体现建筑艺术与园林美学,更深嵌于士人文化、城市结构与生活方式之中,其意义需在空间、制度与文化互动中理解。认识的转向,要求建立“关系性理解—过程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路径,从静态对象转向动态生成,从单一维度转向多重结构,从表层形态深入历史逻辑,以增强理论解释的系统性与穿透力。

价值论维度探讨“文化遗产为何重要”,这不仅涉及文化意义判断,更关乎国家发展与文明延续的根本逻辑。在中国语境下,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审美或历史层面,更在于文明维系与社会整合功能。例如,福建土楼不仅是独特的聚居建筑形式,更承载着宗族组织、社会治理与防御体系的综合功能,体现出文化遗产在维系社会结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代语境下,文化遗产的价值延展至国家认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优化以及社会凝聚力增强等多个层面。因此,价值论不仅指向意义判断,更是对文化遗产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功能定位的理论确认,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桥梁。

方法论维度回答“如何实现理论建构”。文化遗产学高度交叉,涵盖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及环境科学等领域,单一学科难以独立完成整体解释。方法论需要突破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协同机制,兼顾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案研究。例如,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研究既需要考古学对遗存形态的精细分析,也需要历史学整体解释秦代国家结构,并辅以材料科

学研究技术体系,通过多维整合还原其作为国家象征系统的完整意义。方法论为其提供了系统思维与研究路径,是理论建构的操作性支撑。

由此可知,本体论奠定研究对象存在基础,明确“研究什么”;认识论界定理解路径,回答“如何理解”;价值论指明意义判断,聚焦“为何重要”;方法论提供实现路径,回答“如何实现”,四者层层递进、相互嵌套,共同支撑起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框架。这一框架的确立,有助于推动学科内部逻辑的系统化,更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正在从经验积累走向理论自觉,从局部阐释走向系统建构,从知识输入走向范式生成,从而在世界文化遗产知识体系中确立中国表达的理论地位与话语影响力。

以理论自觉推进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跃升

在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研究范式是决定知识生成、文明理解以及中国表达的关键枢纽,既要兼顾学科建设、实践应用与国际话语参与,也要以理论自觉指导学科发展,还需及时回应“如何研究文化遗产”“如何生成关于中国的理论”“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内在运行机制”,以及“如何在世界知识体系中提出中国方案”等重大理论命题。其关键在于将中国文化遗产实践中蕴含的标识性基本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转化为研究命题、知识话语、学术理论。

一是建立内生化的知识生产机制。学术评价体系应突出“中国经验”的原创性和中国问题的牵引性,鼓励学者从中国文化遗产自身结构出发提炼理论概念,着力学术创新、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形成自主生成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推动“文化遗产学”设立一级学科,从学科体系上形成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多维协同机制,形成融合学科支撑、新兴学科赋能、交叉学科融合、冷门学科传承的发展格局,实现微观细节与宏观结构的有机连接,确保理论生成具备系统性与可操作性,为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提供持续动力。

二是强化文化认知与文明解释能力。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将遗产形态、制度结构与文化实践整合分析,同时兼顾历史延续性、现实适应性与未来发展潜力。学理思辨上应通过结构性分析与过程性研究相结合,揭示文化遗产的内在运行机制和多层级关联,形成对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与韧性的系统认知。研究策略应兼顾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将遗产的历史价值、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纳入整体判断,使文化认知不仅停留在感性认知层面,还能够支撑理论建构、学科发展与社会应用,推动文化遗产学在解释力与应用性上的双重提升。

三是提升文明互鉴与全球话语能力。着力将中国文化遗产实践中的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工具,使中国话语能够在国际学术交流与文化治理中发挥实质作用。通过构建可对话的分析范式,使中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国际表达、从中国方案到世界贡献的理论闭环。由此,中国文化遗产学能够参与全球知识生产,实现从经验展示者向规则制定者与理论建构者的转型,巩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话语体系中的主动地位。

四是构建系统整合的操作路径。形成知识生产为核心、文明认知为中层,国际话语为外延,由内向外、递进有序的动态体系,建立跨学科、跨层级、跨维度的协同机制,将微观研究与宏观分析、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学科生成与社会应用统一起来,尤其要打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的转换机制,提炼概括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和理论命题。

中国文化遗产学理论方法的范式跃升,意味着从经验归纳走向结构建构,从单一学科方法走向系统整合路径,从地方性知识走向全球性表达能力。通过在理论生成机制上实现自主,在文明解释层面实现深化,在全球对话层面实现参与,中国文化遗产学就会形成具有持续生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通过“本体的保护传承”实现“文明的持续生成”,并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把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价值理念与当代中国实践贯通起来,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抬眼望向首都东方,历经十余载擘画营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简称“副中心”),一座气象嶄新的现代化新城铺展于世人眼前。规划建设副中心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也是落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首都空间布局、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关键载体。如今,这座新城的城市骨架基本成型,政务运行、产业培育、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稳步推进,副中心建设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效。缓步路县故城遗址公园、临风仰望燃灯塔、穿行古镇街巷,随处可见这些年文保赋能城建结下的文脉硕果,丰富的古遗存化作副中心这幅美丽时代画卷里可瞻可品读的古韵笔墨。

文物发掘与保护,自始至终都是副中心整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曾长期在副中心工程建设一线履职,全程参与了各项工程统筹协调和史料留存工作,见证了十余年间副中心域内考古勘探、遗址发掘、遗产保护及活化利用的完整历程。回望一路走来的副中心建设实践,可以明确得出结论:副中心文物保护工作精准对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总体部署,坚持新城建设与文物保护同步谋划、同步实施、同步落地,副中心建设取得的考古成果、制度成果和文化成果十分丰硕,文保赋能副中心工程建设对全国统筹做好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顶层规划将文物保护融入城市建设全程

在副中心规划建设之初,中央及北京市相关部门就摒弃了重大工程建设中常见的先建设、后补救的传统模式,将文物保护摆在副中心城市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建立考古前置、全域保护贯穿总体规划、控规落地、土地出让、项目施工全链条的常态化机制,确保副中心规划建设推进到哪里,考古勘探和文物保护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在法定规划层面,大运河文化遗产、路县故城遗址、通州古城、张家湾古镇等核心文化资源全部被纳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精准划定刚性保护边界,形成“一河三城”的整体保护格局。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北京市“先考古、后出让”制度,把考古勘探作为土地入市的前置条件,从制度层面有效避免工程建设对地下文物的破坏。在组织实施层面,组建由文物行政部门、市级文博单位、属地政府和建设单位多方参与的联合工作专班,集结多家专业考古队伍进驻工程现场,开展全域勘探与重点区域抢救性发掘。

十余年来,副中心不断完成多项大规模考古勘探任务,已经清理出战国至明清墓葬千余座,窑址、建筑基址等遗迹上百处,出土各类文物上万件(套),完整地梳理出通州地区两千余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脉络。工程项目建设时序根据考古发掘进度动态调整优化,文物保护方案同步纳入工程项目科研、设计和施工各环节,重要遗址周边道路、市政管线主动优化避让,真正实现副中心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并行不悖、互促共进。这套同步推进机制能够落地见效,根源在于副中心规划建设既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同时坚持精准服务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局。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要求持续充实首都历史文化家底,优化市域文化空间布局。副中心建设通过系统性考古和遗产保护,补齐了北京东部历史文化研究短板,拓展了大运河北京段的展示利用空间,极大地完善了首都东部区域文化功能布局,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向东延展的重要支撑点,实现了千年大计落地与首都文化战略实施的同频共振。

考古发掘夯实全区域历史文化根基

伴随副中心十年城市建设同步开展的考古工作,已经产生出多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考古发现,一大批埋藏地下千年的遗存重现于世,为研判北京东部区域的历史沿革、梳理大运河漕运发展史提供了丰富、扎实的实物依据,充分体现了文物保护作为副中心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成果。

路县故城遗址是副中心文物保护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伴随行政办公区建设而开展的这项重大考古工作,完整地呈现了西汉时期路县故城城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城址是通州地区现存最早的汉代县级城址,实证西汉时期这里已是华北地区重要的行政节点和陆地要道,将通州建城史向前推进了两千余年。为完整保留古城的整体格局,副中心建设主动调整城市主干道走向和地下管网布局,通过城市建设主动为遗址保护让路,切实践行文保优先的工作理念。如今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投用,很好地融合遗址保护、生态绿地与公共休闲功能,实现了大遗址保护与现代化城市相融共生。有关部门统计,遗址公园开园以来年均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成为研究和展示北京早期城市发展史的重要窗口。

大运河通州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北端起点,是副中心的核心文化资源。十年间,副中心结合城市建设开展运河沿线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先后发现小圣庙遗址、张家湾古镇码头等多处重要遗存。小圣庙遗址完整地保留了清代河神祭祀建筑群基址,为研究古代漕运管理制度与运河民俗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依托考古成果而建设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坐落于城市绿心三大文化建筑群之中,串联起沿线各类遗产节点,构建起河道本体、古蹟遗存、博物馆集群联动的副中心活态传承体系,让千年漕运文脉在副中心新城建设中得以延续传承。

除此之外,副中心全域发掘的历代墓葬群、古窑址以及古城遗迹,构建起先秦至近现代完整的历史序列。燃灯塔、老城胡同街巷等地上文物也完成系统性修缮与活化利用。副中心工程建设中出土的海量文物与遗存资源,不仅丰富了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的馆藏内容与研究素材,更补齐了新建城区历史底蕴相对薄弱的短板,充分印证同步推进模式

纵观十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协同推进的实践全程不难发现,作为整体建设重要一环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取得了圆满成功。实践充分证明,统筹重大工程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完全可以实现“1+1>2”的综合效益。

能够兼顾城市建设与文脉传承两大目标。

活化利用构建保护发展良性循环格局

多年来,副中心严格遵循国家文物局关于文物活化利用的相关要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走出一条遗产保护、生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可行路径,让丰富的文物资源融入现代城市日常生活,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在保护手段上,因地制宜采用覆土保护、架空栈道、玻璃幕墙原址展示等成熟技术,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平衡好遗址本体保护与对外开放参观的需求。同步搭建文物数字化档案库,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测绘、场景数字化复原等技术手段,完成全域文物信息建档留存,为长期科研与永久保存提供支撑。

在公共文化服务层面,常态化组织考古工地开放日、文物修复体验、运河专题展览等科普活动,把考古现场打造为大众文化课堂,将出土文物引入城市公园、交通枢纽等公共空间,方便京内外游客和广大首都市民就近感悟本土历史文脉。

在文旅融合层面,副中心依托路县故城遗址、大运河等核心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尽最大可能将域内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软实力和民生福祉,很好地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提升。

副中心的这套文物保护利用模式守住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文物安全底线,也持续提升着副中心的城市文化品质,不断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实践案例与硬核文化内容,是首都文化建设在东部区域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

十年实践创造出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纵观十年来副中心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协同推进的实践全程不难发现,作为整体建设重要一环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取得了圆满成功。实践充分证明,统筹重大工程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完全可以实现“1+1>2”的综合效益。副中心文物保护工作形成的实践经验具有以下借鉴意义。

一是坚持理论引领,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文物工作全过程。副中心建设实践表明,伴随项目施工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把文物工作要落实到规划、发掘、保护、利用各个环节,必须坚守“保护第一”底线,摒弃重开发轻保护的短视思维,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我国文物事业长远可持续发展。

二是锚定战略定位,主动服务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局。副中心文物保护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于副中心规划建设紧紧对标首都文化建根本任务,主动对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关工作,把区域文保工作深度嵌入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全局,以局部工作服务整体战略布局。

三是坚持统筹推进,建立全周期闭环工作机制。新城建设必须统筹保护考古前置常态化、制度化,这样才能从源头化解建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将文物保护牢牢嵌入城市整体规划建设体系之中,才能实现城市规划建设与历史文脉传承的相辅相成、共赢共生。

文脉护航城建,古韵共生新城。作为一名一线亲历者,笔者见证了副中心在落实千年大计进程中逐渐探索出一条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同步推进的可行路径。副中心规划建设收获了重大考古成果、建成一套成熟协同机制,打造出一批标志性文化地标。面向未来,相信文物保护护航下的副中心定会进一步擦亮区域文化名片,作为古韵遗存与时代新城共生共长的生动范本,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为全国各类城市新区和重大工程统筹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三版、四版责编:续红明 王娟李端

文物保护赋能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建设与发展

刘生全